

# 民国时期“晨报系”的迁流考察（1916—1937）

郑思源 付登舟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晨报系”主要由《晨钟报》（1916—1918）、《晨报》（1918—1928）、《新晨报》（1928—1930）及《北平晨报》（1930—1937）构成，是民国时期北京报界发行年限最长、权势博弈最剧烈、立场变化最频繁的报系。“晨报系”报刊的三次更名活动，既是政治博弈背景下舆论资源被掠夺的直接后果，又是“晨报系”报人群体在老成员退出和新成员加入的过程中维持“晨报系”的生存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回顾“晨报系”二十年发行史，“晨报系”报人群体屡次受到各方政治力量的监视、审查与查封，却又屡次在权势更迭的夹缝中涅槃重生。他们在各方政治势力的裹挟态势下不断调整编辑策略，最大限度地争取编辑报道的自主公正，却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在权势更迭的背景下，“晨报系”越与“政治”保持距离，就越无可避免被卷入政治旋涡；越避免军阀的染指，就越容易遭受各派政治势力的掠夺。在新闻自由的职业理想中，“晨报系”越强调编辑报道的客观公正，就越无法独立自主决定内容策划。这不仅反映了“晨报系”报人群体在权力规训和职业理想之间的抗争与权变，也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更迭与思潮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样本。总之，“晨报系”的迁流历程，勾勒了近代中国报人群体在接受权力规训与争取新闻自由的夹缝中艰难腾挪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民国时期 晨报系 报人群体 新闻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9.29; 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1-0130-10

民初至抗战前夕，北京晨报馆相继出版了《晨钟报》（1916—1918）、《晨报》（1918—1928）、《新晨报》（1928—1930）、《北平晨报》（1930—1937）四种以“晨报”命名的报刊，它们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报刊体系——“晨报系”。与《公言报》《京报》《世界日报》等受外力摧残被迫停刊的北京报刊相比，“晨报系”自1916年至1937年屡屡于危局之中涅槃重生，成为民国北京报界转型最复杂、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系。它不仅以其紧密的政治联系，见证了近代中国权势更迭下的报业隆替，还以其

广泛的舆论影响，助推了民国社会的思潮演变，是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篇章。当前学界多聚焦于《晨钟报》《晨报》及其副刊的政治、社会、文学影响，对“晨报系”的编辑出版系统亦有涉及<sup>[1-4]</sup>，然对“晨报系”的整体性考察仍付之阙如。实际上，将“晨报系”报纸名称的反复变更、报人群体的几度流转、编辑策略的一再调整，纳入近代中国权势转移的时代大势中加以考察，可以形象地勾勒近代中国报人群体在接受权力规训与争取新闻自由之间艰难腾挪的历史图景。

**收稿日期：**2025-05-25；**修回日期：**2025-06-25

**作者简介：**郑思源，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报刊与文化研究；付登舟，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报刊与文化研究。

## 一、权势更迭与“晨报系”的三次易名

民国时期“晨报系”经历了从《晨钟报》到《晨报》到《新晨报》再到《北平晨报》的三次更名过程，每一次更名都与民国政局的权势更迭密切相关。《晨钟报》是“晨报系”的第一份报刊，由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于1916年8月15日在北京宣武门外丞相胡同创办<sup>[5]</sup>，是研究系与北洋军阀“同床异梦”式政治合作的产物。就研究系而论，《晨钟报》以“研究系”的名义“在政言政”，谋求与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互嵌，同时也警惕北洋军阀利用《晨钟报》的政治宣传粉饰其专权行径。就北洋军阀而论，研究系主张中央集权的宪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因迎合了段祺瑞的独裁需要而受到亲段军阀的支持，然北洋军阀“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决定了其一面借用《晨钟报》的政治宣传“点缀北洋门面”<sup>[6](P235)</sup>，一面防范《晨钟报》对其专权行径的揭露，在默许研究系经营《晨钟报》的同时，又试图以权力胁迫其保持立场一致。

1917年，在“府院之争”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段祺瑞怂恿张勋复辟帝制，间接实现“驱黎”的专权目标，导致北京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同年7月，《晨钟报》在停刊五天后也被迫迁往天津发行。<sup>[7]</sup>张勋复辟的闹剧逐渐使“研究系”意识到北洋军阀的狡诈与蛮横，当段祺瑞以民国已被张勋所毁的借口，妄图以“再造共和”的名义独揽军政大权，继续破坏民主政治原则时，

“研究系”彻底认清了北洋军阀“不足与谋宪政”<sup>[8](P92)</sup>的虚伪面目，以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为代表的研究系成员相继退出了内阁。《晨钟报》回迁北京后，舆论立场也逐渐从维护北洋政府转向批评军阀独裁。随着“研究系”与北洋军阀的政治疏离，段祺瑞也不愿再容忍来自《晨钟报》的批评，1918年9月，段祺瑞遂借《晨钟报》揭露其对日借款内幕之机，授意京师警察厅查封报馆。<sup>[9]</sup>对此，《晨钟报》总编辑刘以芬表示，揭露借款消息的报刊不在少数，然“则固然无恙

矣”，唯《晨钟报》被查封，足见“彼辈早视若眼中钉，密谋取缔”。<sup>[8](P18)</sup>这也意味着“研究系”通过《晨钟报》实现“在政言政”的政治努力终遭失败。

1918年12月，被段祺瑞政府查封的《晨钟报》经过三个月的整顿后，开始以《晨报》名义恢复发行。作为晨报系的第二份报刊，《晨报》同人吸取《晨钟报》因“在政言政”而被暴力查封的教训，乃极力弱化《晨报》的参政色彩而强化其议政属性。对此，《晨报》总编辑蒲殿俊表示：“我们负著舆论界的责任，话总是不能不说的；不对政治当局说话，就该转过方面专对多数国民说话。”<sup>[10]</sup>可见，《晨报》自创刊起便试图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践行“在学言政”的舆论监督责任。事实上，正是“晨报系”由《晨钟报》“在政言政”到《晨报》“在学言政”角色转型，才使其得以游刃于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之间，维持了近十年的生存发展，但也为其走向终结埋下伏笔。

为了生存和发展，《晨报》不可避免地与北洋军阀势力产生联系，甚至寻求军阀势力的支持。例如，1927年张作霖把持北京政权期间，为“反赤讨蒋”采取严密的舆论控制政策，《晨报》总编辑陈博生在日本留学时即与张学良结识<sup>[11]</sup>，且“张学良住北京时，与陈往来颇密”<sup>[12](P127)</sup>，故《晨报》的发行业务几乎不受影响。《晨报》也因此被部分报人斥为受张氏父子操纵而“专替大元帅讲话”<sup>[13](P45)</sup>的报纸，北伐战争爆发之际，《晨报》更被国民党扣以“完全反动”<sup>[14](P247)</sup>的帽子。1928年6月4日，当北伐军兵临城下之际，张作霖在回撤东北途中遇袭身亡，奉系军阀无暇他顾，《晨报》既失去依托，又惧于北伐革命力量的清算，不得不于6月5日紧急停刊。

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以晋系军阀首领阎锡山为北平警备司令。阎锡山接管北平后，授意幕僚李庆芳接管《晨报》所有机器财产，经过整顿后又以《新晨报》的名义于1928年8月5日在北平宣武门外大街181号正式发行。<sup>[15]</sup>作为“晨报系”的第三份报刊，

《新晨报》在阎锡山“去北洋化”的权力规训下,完全沦为晋系军阀的传声筒,从支持国民党的统一到支持分裂、从“拥蒋”统一到“讨蒋”另立新政府,《新晨报》随着晋系军阀的政治诉求一再变换舆论立场。时评甚至视《新晨报》为“北平首屈一指之晋派机关报”<sup>[16]</sup>。

中原大战后,东北军替代晋系军阀进驻北平,《新晨报》在1930年9月23日发行最后一期后停刊。张学良进驻北平后,对《新晨报》又展开了一轮“去晋系化”的权力规训,并委任陈博生接管《新晨报》,陈博生遂将原《新晨报》更名为《北平晨报》,并于1930年12月16日正式发行。《北平晨报》在创刊号首页特别声明:“本报系同人创办,与旧《晨报》及《新晨报》毫无关系。”<sup>[17]</sup>但又刊登陈振先的评价“近年北平报界中,晨报及其继承者在学界中最负时誉,《晨报》停刊后不久,《新晨报》继之,《新晨报》停刊后不久,今《北平晨报》又继之。社址犹是,云物不殊,名称依然,事业犹昔”<sup>[18]</sup>,以此暗示《北平晨报》在“晨报系”中的延续性。作为

“晨报系”的第四份报刊,《北平晨报》自创刊发行起,便受到南京政府的新闻统制政策的影响。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北平晨报》内部虽然发生过几次人事改组,但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更替与调动的结果;第二,《北平晨报》发行时期适逢日本侵略势力猖獗,中国逐渐由局部抗战迈向全面抗战,该报对日舆论立场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经历了从绥靖到强硬的明显转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势力占领北平后也妄图对《北平晨报》进行“去中国化”的权力规训,使其成为受日本侵略势力控制的报刊。然而,《北平晨报》为避免成为日本侵略势力的传声筒,在不断缩减版面的同时,又拒绝作主观的舆论引导,转向客观的战时新闻报道。在日本侵略势力处处钳制的压迫之下,“晨报系”报人群体最后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被侵占殆尽,《北平晨报》最终于1937年10月15日停刊。发行二十余年的“晨报系”报刊也走向了终

局。尽管日伪当局劫持“晨报系”的声誉资源,于1939年6月重新挂出《北平晨报》的旗号发行附逆报纸<sup>[19](P228)</sup>,但与“晨报系”下的《北平晨报》已毫无关系。

总之,《晨钟报》《晨报》《新晨报》《北平晨报》的三次更名活动,折射了“晨报系”报人群体在权势更迭背景下,既希望通过调整办报方针以坚守新闻自主的职业道德,却又无可避免地受到各方政治势力规训的窘境。

## 二、政潮涌动与“晨报系”报人群体的流转

“晨报系”经过三次更名仍致力于谋求新闻自主的背后,必然离不开报人群体的竭力维持。实际上,“晨报系”自创办第一份报刊起,其报人群体就处于一个接力式办报的状态,“晨报系”的人事变动既是各方政治势力、文化思潮互相角逐、激荡的产物,也是民国报人群体在权势更迭的大潮中艰难腾挪的缩影。

学界或以《晨钟报》由研究系魁首汤化龙创办<sup>[20]</sup>,或以梁启超、汤化龙联合创办为主流论调,无论哪种观点都表明《晨钟报》报人群体是在研究系的主持下成长起来的。在研究系同人的授意下,《晨钟报》总经理由汤化龙的私人秘书刘道铿担任<sup>[21](P63)</sup>,并作为《晨钟报》的第一责任人,总管报刊的办刊宗旨、舆论立场及发行事宜。李大钊曾受汤化龙的资助赴日留学,归国以后担任《晨钟报》总编辑一职,主要负责报刊的内容策划、舆论导向。然而,研究系成员很快察觉到李大钊在政治理念上与他们存在严重分歧,结果李大钊选编的稿件常遭研究系成员删减或被禁止发表<sup>[22](P83)</sup>。李大钊在主编《晨钟报》的过程中亦有掣肘之感,便于1916年9月5日辞去了仅任22天的总编辑职务。

李大钊离开《晨钟报》以后,刘道铿又聘任陈光熹接任《晨钟报》总编辑<sup>[23]</sup>,因其行将赴日留学<sup>[24](P194)</sup>,总编辑又先后由春冰、刘以芬接任。此外,《晨钟报》报人团体还包括蒲殿俊、

陈博生、刘崇佑、李仲公、张东荪及梁秋水诸人，他们凭借“志缘、地缘、学缘关系”<sup>[25]</sup>互相联络，构成了“晨报系”报人群体的基础班底。就志缘而言，陈光焘、刘以芬、刘崇佑均为研究系成员，陈博生、张东荪虽并非研究系成员，但以共同的政治理念与研究系交往密切。就地缘而言，刘道铿、刘崇佑、陈博生皆为福建人，又常以福建话交流报社事宜，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连接。就学缘而言，陈光焘、刘崇佑、刘以芬、陈博生等人均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张东荪则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sup>[26](P34)</sup>，相似的教育背景也强化了彼此之间的理念认同。由此形成了一个以研究系为核心的“晨报系”报人群体，他们致力于将《晨钟报》办成研究系的政治报刊。

1918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成员在汤化龙遇刺、《晨钟报》被查封等系列变故后渐萌退意，“晨报系”报人群体亦逐渐褪去“研究系”外衣，谋求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舆论地位。1918年12月1日，被查封的《晨钟报》开始以《晨报》的名义恢复发行，社长一职虽然仍由原研究系精英蒲殿俊担任，并维持至1922年<sup>[27]</sup>，但也公开声明：“研究会久已消灭，同人中所有行动，均属个人关系”<sup>[28]</sup>，乃极力撇清“晨报系”报人群体与“研究系”的关系。此后，蒲殿俊“因业务管理不善，且与研究系的福建派发生意见”<sup>[8](P94)</sup>，遂将濒临破产的《晨报》管理权转交给刘道铿和陈博生，自己则退出了“晨报系”报人群体。

1923年，刘崇佑接任《晨报》社长后进一步弱化政治色彩，陈博生具体负责《晨报》编辑事宜，并与陈光焘、刘秉麟、瞿秋白等人一同作为《晨报》特约通讯员，前往各国采写国际新闻。<sup>[29]</sup>在刘崇佑、陈博生的经营下，《晨报》吸纳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文人学者，大大提升了“在学言政”的舆论影响力。例如，林仲易自1920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加入“晨报系”，并凭借出色的文笔于1923年起担任《晨报》总编辑。<sup>[30](P321)</sup>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徐志摩、青年学者江绍原、艺术家于非闇，以及后来

的职业记者许君远等也都先后加入“晨报系”报人群体。随着“晨报系”副刊业务的扩展，李大钊、孙梓芳、孙伏园、徐志摩、瞿世英等人又曾先后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晨报》的人事变动，反映了“晨报系”报人群体脱离研究系主导后，在共同的宗旨下谋生存、求发展的尝试与探索。

1928年6月《晨报》停刊后，“晨报系”同人于战乱之下逃散各处，唯陈博生、林仲易“最初有意把报馆迁到天津租界”维持生存，然“久议而未成功”。<sup>[31]</sup>此后，陈博生游学欧洲，回国后前往东北发展<sup>[32](P30)</sup>，林仲易转而主持《民言报》发行事宜<sup>[30](P322)</sup>。

阎锡山入驻北平后，授意李庆芳就原址创办《新晨报》。李庆芳自任《新晨报》社长，迅速组建了受晋系军阀掌控的发行团队，乃聘请由刘文炳担任总编辑，罗秋心、张慎之又接任<sup>[33](P104)</sup>，邓之诚任主笔，谭丕模为编辑主任，孙祥偈为副刊主编。此外，《新晨报》发行团队还包括孙幼铭、张翰飞、李长路等人。1930年9月24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李庆芳趁隙逃离北平，其发行团队亦自行解散，发行两年的《新晨报》在晋系势败后宣告停刊。

1930年，原“晨报系”同人开始互相联络谋求恢复发行，刘崇佑等一批老成员退出“晨报系”后，一批新的报人力量又陆续加入《北平晨报》。对此，《新晨报》社论编辑孙幼铭之子孙崇莞回忆道：“《新晨报》与《民言报》于1930年九月同一天停刊，先父与林仲易、张翰飞、徐敬一等好友及新晨同人曾多次商谈报事……两个礼拜以后，赴《新晨报》旧址，主办人陈博生要办新报——《北平晨报》。”<sup>[34](P67)</sup>陈博生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开始担任《北平晨报》社长兼总主笔，林仲易任总经理兼总编辑。<sup>[35](P180)</sup>林仲易还将《民言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班底，从编采人员到排印技工”全部招募进《北平晨报》。<sup>[32](P30)</sup>此外，詹辱生、瞿冰森（《晨报》副刊主编瞿菊农之弟）、张溥野（《晨报》撰稿人张恨水之弟）、林颖生、费图南、孙幼铭、徐茂先等人逐渐成为

“晨报系”报人群体的重要成员。<sup>[36](P296)</sup>由此而言，“晨报系”报人群体在李庆芳主持业务期间短暂分散后，在陈博生的带领下重新凝聚起来，继续在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中摸索前进。

诚如时评所言：“‘晨报’这两个字，在报界终究是有权威的。”<sup>[37]</sup>“晨报系”作为一种重要的舆论宣传资源，仍然面临着各方政治势力的攘夺压力。尤其是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期间，便以《北平晨报》“在平津拥有广大读者，正可利用它作为宣传的机构”<sup>[32](P95)</sup>的缘故试图强制接管该报。1936年3月19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强制干预下，《北平晨报》被迫改组，冀察政务委员刘哲接替陈博生担任《北平晨报》社长，田雨时任总经理，张慎之担任总编辑，秦德纯、萧振瀛、雷嗣尚、刘哲、田雨时、戈定远和赵雨时七人组成新董事会。<sup>[38]</sup>原社长陈博生、总经理林仲易及编辑部、经理处两大核心部门的二十多名成员集体辞职<sup>[39]</sup>，以示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决议的不满。《北平晨报》的人事变动表明“晨报系”报人群体逐渐被冀察政务委员会分化，就连黎世芬也表示改组后的《北平晨报》只“保存了过去的《北平晨报》的躯壳”，变成了当局“机关报”了。<sup>[40]</sup>

随着国民反日情绪高涨，蒋介石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12月10日再次对《北平晨报》进行改组。<sup>[41]</sup>罗隆基接替刘哲、田雨时任《北平晨报》社长兼经理，生宝堂担任业务主任，谢友兰担任总编辑。由秦德纯、雷嗣尚、邓哲熙、章士钊、潘毓桂、张璧及罗隆基组成董事会<sup>[42]</sup>，发行业务则由杨君如、傅永汉、高光斗、刘伏生、江汉生、原景信、田英魁等人负责。田雨时、张慎之、贲毓瑄、史训迁、丁作韶等人亦宣布集体辞职。<sup>[43]</sup>

北平沦陷后，罗隆基宣布辞去社长职务，宋维明继任<sup>[44]</sup>，“晨报系”报人群体在维持生存和避免沦为日人舆论工具的夹缝中走向解体。

1940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聘请陈博生担任《中央日报》社长，陈博生将《北平晨报》的核心班子带至《中央日报》，他自任总主

笔，詹辱生任总编辑，张明炜任总经理，孙伏园负责副刊，刘尊棋任采访主任。《中央日报》重庆时期的总编辑王抡榦评价这支队伍“集中了办报名家，可谓阵容整齐”<sup>[45](P410)</sup>，堪称对“晨报系”报人群体实至名归的表彰。

总之，“晨报系”报人群体始终处于一个“前贤已往后贤来”的流动状态，这种接力式办报的过程不仅是“晨报系”报刊得以改组、重生的灵活机制，更是民国报人群体在危机中博弈、生存的重要面向。

### 三、时局因应与“晨报系”编辑策略的调整

“晨报系”报人群体对新闻自由主张的争取集中体现在他们对报纸内容策划、舆论立场的自主性上，报道什么、怎样报道既是“晨报系”报人群体编辑策略的体现，又是他们与各派军阀、侵略势力抗争、妥协的结果。因此，“晨报系”下的四份报纸在内容编辑上既有稳定不变的母题，也有随机应变的话题。

《晨钟报》自创刊便秉持“据事直书，不偏不倚，代表国民之旨，使公是非、公好恶，伸张于天下”<sup>[46]</sup>的办报宗旨和“平息党争”“不许阴私”<sup>[47]</sup>的政治原则。尽管社长总管“晨报系”的发行业务，但在具体内容的策划上，总编辑享有较大的裁定空间，甚至决定了报刊的整体风貌。正因如此，“晨报系”的编辑策略往往因人事浮动而一再调整。例如，《晨钟报》的首任总编辑李大钊，曾致力于将《晨钟报》打造成宣传新青年、新思想的舆论阵地，他在发刊词中称：“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sup>[48]</sup>为此，李大钊还特意设计一幅古钟图案，钟身以篆体书写“晨钟之声”，每期在古钟上选登一条诸如“舆论者，维持国家之柱石也”<sup>[49]</sup>的警语。

李大钊主编《晨钟报》不久就引起了“研究系”的警觉，认为他的编辑风格背离了《晨钟报》“在政言政”的参政母题，乃通过删减、驳

回李大钊所编稿件的方式，削弱李大钊对《晨钟报》的影响。李大钊离职后，陈光焘、春冰和刘以芬逐渐强化《晨钟报》政治宣传的职能，李大钊开设的“新思潮”“新智海”栏目相继被叫停，就连他为《晨钟报》设计的“晨钟之声”标志也于1917年7月从《晨钟报》的版面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见商榷”“社会之声”“大鸣小鸣”等政治宣传栏目，公开宣传研究系的宪政思想和政治建设意见。

《晨钟报》的编辑策略不仅受报人群体的理念影响，还时常受到北洋军阀的干扰。《晨钟报》初因“研究系”与段祺瑞政府的政治合作，在1916年至1917年间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随着段祺瑞与研究系的政治疏离，《晨钟报》的编辑报道开始受到段祺瑞政府的干预。1917年5月，新闻邮电检查制度重新施行后，《晨钟报》大幅减少了时评文章的刊发，各类评论栏目被一应削减，除张勋复辟时期发表过多篇批判复辟逆流的时评外，《晨钟报》上几乎见不到批评政府的言论。

当研究系通过张勋复辟看清段祺瑞的独裁本质后，《晨钟报》开始越过新闻管制红线，对段祺瑞政府发起猛烈抨击。1917年12月，《晨钟报》刊登了孙洪伊致总统的电文，严厉抨击段祺瑞“恣行专制，破坏国本”，“段氏之罪，在破坏约法”。<sup>[50]</sup>针对中日外交纠纷，《晨钟报》发表社论：“我总统、总理、主将，全国枢机总长，躬负交涉责任，当已愤切日人之无理，而急伸捍卫国家之大义。乃数月之久，尚无解决之消息。”<sup>[51]</sup>以表达对段祺瑞政府外交软弱的不满。针对段祺瑞同日本签订“西原借款”一事，《晨钟报》直言不讳地揭露其内幕及政治风险，并严词批评段祺瑞为“内乱之根源”<sup>[52]</sup>。《晨钟报》的舆论攻势甚至引发了友刊的侧目，《神州日报》评论《晨钟报》“近日屡屡以中日交涉之译件揭载报端，并对于徐树铮等渐渐加以讪骂之词……亦即间接攻段也。”<sup>[53]</sup>然而，一系列针对段祺瑞政府的政治抨击最终也成为《晨钟报》被段祺瑞政府查封的导火索。

《晨报》鉴于《晨钟报》因“在政言政”而招致查封的教训，开始调整编辑策略，极力撇清“晨报系”报人群体与政党之间的瓜葛，又唯恐舆论界再以党派媒体的旧形象视之，因此“晨报系”同人一有机会便在《晨报》上反复申明其“不偏不党底态度”，“我们决不肯替一党一派说法”<sup>[54]</sup>的编辑立场。1925年发生“火烧晨报馆”案后，“晨报系”同人再次声明：“吾《晨报》之创办人中，诚有曾隶研究系者，然此属个人行为，与党无干。”<sup>[55]</sup>直到1927年《晨报》仍然强调其“超然于现实势力之上”<sup>[56]</sup>的编辑宗旨，反映了“晨报系”报人群体从《晨钟报》之“在政言政”到《晨报》之“在学言政”的策略调整。

在保持距离地批评政治的同时，《晨报》开始强调对“社会教育”<sup>[57]</sup>的担当，极力打造“教育界机关报”<sup>[58]</sup>的舆论影响力。为此，《晨报》开设“自由论坛”“妇女问题”等栏目，接受高校师生的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投稿，报道主题大多与青年学生的教育、就业、社会活动相关。例如，在学生就业观问题上，《晨报》刊发了《青年学生的危机》等文章<sup>[59]</sup>，在“妇女问题”专栏，先后发表《大学宜首开女禁论》《大学应该对女子开放》等呼吁国立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制度的文章，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此外，《晨报》增加对学术动态、学生运动的报道。1919年2月，李大钊再次加盟《晨报》后，便在副刊上增设了“马克思研究”等栏目，刊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7月，孙伏园加入“晨报系”报人群体后，《晨报》及其副刊的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众多五四新文学作家投稿，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不周山》等作品均首发于《晨报》副刊上。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对学生罢课、被捕与获释详情以及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进行全面的追踪报道。

1926年，张作霖主政北京后继续执行新闻管制政策，“晨报系”同人在坚持新闻自主和防范军阀干扰的窘境中，谨慎地拿捏着编辑报道的分寸感。例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

京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晨报》一面揭露张作霖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一面向青年学生解释,政治上的顽疾“断非一朝聚集数百尚未成品之青年,徒手空号所能成事”<sup>[60]</sup>。这种舆论立场既隐晦地表达了对青年学生的同情,也反映了“晨报系”报人群体在权力胁迫下的编辑策略。

《新晨报》创刊后,为继承《晨报》的影响力,在版面布局上极力模仿《晨报》风格,以至于时人评价“其报头形式,犹是昔年,第加一新字而已,实即旧《晨报》所蜕变者也”<sup>[61]</sup>,然舆论立场近乎忠实地反映晋系军阀的政治诉求。例如,当晋系军阀尚未与蒋介石政府反目时,《新晨报》对蒋介石“裁兵”方案的报道呈现出迎合态度,声称“裁兵声浪弥漫于全国各界,成为目前唯一紧要问题”<sup>[62]</sup>,舆论上充满对蒋介石的支持。但当蒋介石的裁兵方案触动晋系军阀利益的时候,《新晨报》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反转,不仅声讨蒋介石破坏党内团结,“像这样迁延下去,党的基础,马上就要崩溃”<sup>[63]</sup>,还大量刊登诸如“吾人对编造前途不能不抱几分杞忧”<sup>[64]</sup>等唱衰裁兵方案的社论文章。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发出“蒸电”公开斥责蒋介石重演武力统一的老把戏,《新晨报》立即跟进社论,塑造“阎氏不愿参加内战”<sup>[65]</sup>的正义形象,同时又痛斥国民党“不亡于英美,而亡于蒋中正,此全国所以一致讨蒋者”<sup>[66]</sup>,表明《新晨报》的内容报道始终与晋系军阀的政治利益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晨报》在政治报道上始终由晋系军阀控制,但其副刊仍然延续了“晨报系”在文化领域的编辑策略。周作人、老舍、黎锦明、台静农等一批曾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的作家,依然活跃于《新晨报》的副刊版面上。内容编辑上,《新晨报》副刊大量刊载文学、史学、艺术等主题的报道,大有抢占正刊风头之势。对此,张静庐评价道:“虽然换了一个局面,《新晨报》却还能保留他旧《晨报》的时代的几处特点。”<sup>[13](P49)</sup>由此可见,《新晨报》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依附于晋系军阀,但仍然在最

大限度地争取文化领域的编辑自主权。

《北平晨报》创刊后,力求以“不激不随,无偏无我”“对政府为忠实之诤友,对国家为诚恳之公民”<sup>[67]</sup>的舆论立场,回归《晨报》及《新晨报》副刊对时事政治、文化建设的编辑自主性。然而,在各派政治力量“见风使舵”的复杂博弈中,《北平晨报》“不站队”式的编辑风格,反倒显得“怀璧其罪”,忽而被污蔑为“华北一带公认的‘亲中央’的报纸”<sup>[33](P104)</sup>,忽而被质问“为何甘为日人喉舌”<sup>[68]</sup>,成为持不同立场的报刊忌惮、打压的对象。事实上,“晨报系”同人在编辑《北平晨报》过程中并没有避重就轻的片面报道,反而在一些重要历史节点上展现出“晨报系”报人群体的编辑自主和民族自觉。

例如,针对日本捏造的大东亚“共存共荣”论调,《北平晨报》毫不畏惧地揭穿其谎言:“若日本必陷中国于不能存不能荣之地位,则存且不得,共于何有?”<sup>[69]</sup>一语道破其觊觎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野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晨报》一面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及压制抗日舆论的做法,斥责蒋介石误国卖国以“贻今日之巨患”<sup>[70]</sup>;一面加大抗日舆论宣传,开设“对日舆论”专栏为各界爱国人士提供宣传抗日主张、凝聚抗日力量的平台,并随刊免费附赠“国难写真”<sup>[71]</sup>,曝光日军在沈阳街头扫射中国军民的暴行。此外,《北平晨报》还延续“晨报系”注重文化建设的编辑策略,大量刊载中外文学、学术动态,胡适、周作人、冰心、老舍、黎锦明等作家仍继续为其供稿。

随着北平局势的恶化,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强化了新闻统制,《北平晨报》的编辑报道受到强制干预。对此,《北平晨报》总编辑林仲易感慨道:“检查新闻,本无一定,某条可登,某条不可登,亦无一定之范围……以故某种消息见于天津报而不见于北平诸报者,非报馆遗漏,实受环境之牵制耳。”<sup>[72]</sup>编辑刘尊棋也表示这一时期“处理新闻稿是非常棘手的”。尽管《北平晨报》的编辑自主性受到新闻统制政策的钳制,但“晨报系”报人群体依然“在不违背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的禁令范围内”谨慎地维持着编辑报道的“客观和真实”。<sup>[73](P31)</sup>

1936年，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北平晨报》“不利于己”<sup>[74]</sup>而强制改组，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胁迫下，《北平晨报》连续发表了《中日认识宜多接触》《中日关系调整之前途》《所望于有田大师者》等多篇倡导“中日亲善”的文章。<sup>[75-77]</sup>对此，田雨时无奈道：“我们的报道与言论，必须切实配合当局措施，并力求尽其对于时局的影响力。”面对《北平晨报》编辑自主性被冀察政务委员会攘夺的情况，田雨时又表示：“每酌予适度的新闻吐露，甚而有意的促动社会与舆论注视，博取有助于谈判的声援，稍戢敌人的气焰。纵然类此分寸很难恰到好处，随时可能遭受日方及汉奸的借口干扰，乃至我方当局的误解督责，任何文字之祸横来，那是我们无法完全预防或顾忌的。”<sup>[78]</sup>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二次改组后的《北平晨报》又展现出明确的抗日立场，在全国日渐高涨的抗日情绪下，相继推出了《民意》《现代政治》《文艺》《青年问题》等一系列反映广大民众政治诉求和文化需要的副刊，使《北平晨报》一度实现“日销数万”的规模。<sup>[79]</sup>这深刻反映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新闻统制和日本侵略势力的压迫下，“晨报系”报人群体一面争取独立编辑自主性，一面应付各派政治力量强制干预《北平晨报》编辑报道的艰难处境。

#### 四、结语

《晨钟报》《晨报》《新晨报》《北平晨报》在报刊声誉、报人群体、编辑策略上的继承与演变，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报刊界发行年限最长、权势博弈最剧烈、立场变化最频繁的报系——“晨报系”。首先，《晨钟报》作为研究系与北洋军阀谋求“政治互嵌”的产物，终以“在政言政”的政治言论而遭遇查封；继之而起的《晨报》吸取《晨钟报》言论致败的教训，以“在学言政”的舆论角色周旋于北洋军阀各派

势力之间，终又在北伐战争中受北洋军阀裹挟而停刊；继而又起的《新晨报》在晋系军阀的接管下创刊，又随着晋系军阀的失势而停刊；继而再起的《北平晨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新闻统制下苦心经营，最终在抵制日本侵略势力攘夺的困境下走向终局。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沦陷时期，“晨报系”始终在北京政治漩涡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各派政治力量均以武力相恃对其进行权力规训以服务于政治利益。其次，“晨报系”报人群体在各方政治势力、文化思潮的角逐、震荡过程中既有老成员的退出，又有新成员的补充。他们在与各派势力抗争、妥协的调适过程中接力式维持“晨报系”生存，又不断调整编辑策略以谋求“晨报系”发展的努力，既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报人群体的代际更迭，也揭示了民国报人群体在权势更迭大潮中艰难腾挪的历史图景。管贤翼称：“该报数易系统，名虽存在而其内容随其系统变更，不得不谓为美中不足……盖在中央政府之下，受政府变易之影响，有失独自立场可能性，随政府之变迁乃有不得不停刊易名、改变内容之事实在焉，但此等事态之责任在政府，而非我报人之过耳。”<sup>[80](P313)</sup>诚哉斯言。在权力的巨石下，“晨报系”报人群体就像小草一样，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沿着权力的缝隙努力生长。

#### 参考文献：

- [1] 汤凯宁,丁粮柯.《晨钟报》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宣传策略及影响研究[J].传媒,2024(8): 81-83.
- [2] 薛小荣.“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J].安徽史学,2022(3): 67-75.
- [3] 岳亮.传媒、知识分子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晨报副刊》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 38(11): 45-50.
- [4] 李雷波.抗战前北京“晨报”编辑出版系统演变考实[J].民国研究,2014(1): 213-228.
- [5] 启事[N].晨钟报,1916-08-15(1).
- [6] 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6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7]本报续刊通告[N]. 晨钟报, 1917-07-08(1).
- [8]刘以芬. 民国政史拾遗[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 [9]北京文字狱之原委[N]. 神州日报, 1918-09-28(3).
- [10]蒲伯英. 什么叫政潮什么叫时评? [N]. 晨报, 1923-03-13(2).
- [11]叶明勋, 黄雪邨. 追忆陈博生先生[J]. 传记文学, 1981(39-1): 51-56.
-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4册[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13]张静庐. 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27.
-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上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15]本社开设[N]. 新晨报, 1928-08-05(1).
- [16]新晨报等禁止发行[N]. 盛京时报, 1929-10-29(1).
- [17]本报紧要声明[N]. 北平晨报, 1930-12-16(1).
- [18]陈振先. 且听“持炬者”的足音[N]. 北平晨报, 1930-12-16(8).
- [19]黄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第3版[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 [20]李雷波. 抗战前北京“晨报”编辑出版系统演变考实[J]. 民国研究, 2014(1): 213-228.
- [21]谢作拳. 朱铎民师友书札[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9.
- [22]《北京地区文学历史及现状》课题组.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8.
- [23]陈光焘启事[N]. 晨钟报, 1916-09-05(2).
- [24]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成都文史资料: 第28辑 蜀都俊彦[M]. 成都: 成都出版社, 1995.
- [25]付登舟, 赵晨韵. 晚清报人群体演进的历史考察[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77-88, 175.
- [26]李晓兰. 审视与批判[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 [27]蒲伯英启事[N]. 晨报, 1923-06-30(2).
- [28]声明[N]. 晨报, 1920-12-06(2).
- [29]共同启事[N]. 晨报, 1920-11-27(2).
- [30]北京档案馆. 北京档案史料1999. 2[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31]许君远. 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J]. 人人周刊, 1947(1-8): 7-9.
- [32]赵效沂. 报坛浮沉四十五年[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
- [33]黄河. 北京报刊史话[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 [34]孙崇莞. 莲阴坞撷华 孙幼铭先生纪念文集[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
- [35]徐明新. 福建新闻史1645-1949[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
- [36]许君远. 许君远文集: 上册[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 [37]麸神. 西京晨报将生 北平晨报易主[N]. 晶报, 1936-02-27(2).
- [38]云. 易主后之北平晨报[N]. 晶报, 1936-03-25(2).
- [39]北平晨报编辑部同人紧要启事[N]. 北平晨报, 1936-03-18(3).
- [40]黎世芬. 北平晨报[J]. 中外月刊, 1936(1-6): 101-107.
- [41]北平晨报改组[N]. 时事新报(上海), 1936-12-29(3).
- [42]本报昨开董事会议[N]. 北平晨报, 1937-01-19(3).
- [43]声明[N]. 北平晨报, 1936-12-27(2).
- [44]本报紧要启事[N]. 北平晨报, 1937-08-01(3).
- [45]王抢擅. 抗战时期的《中央日报》[M]//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16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 [46]魏. 言论自由与不党[N]. 晨钟报, 1916-08-15(3).
- [47]巍. 本报立言之标旨[N]. 晨钟报, 1916-08-15(8).
- [48]守常.“晨钟”之使命[N]. 晨钟报, 1916-08-15(7).
- [49]晨钟之声[N]. 晨钟报, 1916-09-09(2).
- [50]孙洪伊之三段论法[N]. 晨钟报, 1917-12-16(2).
- [51]中国前途尚可问乎[N]. 晨钟报, 1918-01-07(3).
- [52]源泉. 送西原龟三[N]. 晨钟报, 1918-07-28(2).
- [53]半谷. 北京闻见杂录[N]. 神州日报, 1918-04-17(2).
- [54]渊泉. 本报四周纪念日[N]. 晨报, 1922-12-01(2).
- [55]渊泉. 旧战迹与新战线[N]. 晨报, 1925-12-07(2).
- [56]本报整理纸面扩充记载及改革内容之新计划[N]. 晨报, 1927-05-26(1).
- [57]渊泉. 吾报之使命[N]. 晨报, 1923-12-01(2).
- [58]周建侯. 我希望晨报今后对于教育方面应做的两件事[N]. 晨报副刊, 1922-12-01(6).
- [59]徐彦之. 青年学生的危机[N]. 晨报, 1919-04-20(7).
- [60]渊泉. 群众领袖安在? [N]. 晨报, 1926-03-22(2).
- [61]天庐. 青天白日之旧都报界[J]. 新闻学刊, 1928(2-5): 1-4.
- [62]裁兵问题之释疑与裁兵之步骤[N]. 新晨报, 1928-08-06(2).
- [63]荪荃. 建设“新中国的责任”问题[N]. 新晨报, 1929-01-10(2).
- [64]友. 遣编会议之延期[N]. 新晨报, 1929-01-22(2).
- [65]以仁让风全国[N]. 新晨报, 1930-02-14(2).
- [66]德. 全国一致讨蒋矣[N]. 新晨报, 1930-03-19(2).
- [67]本报之使命[N]. 北平晨报, 1930-12-16(1).

- [68]铁民. 质问北平晨报为何甘为日人喉舌? [J]. 铁血周刊, 1932(1-16): 14-15.
- [69]日本与东北铁路问题[N]. 北平晨报, 1930-12-19(1).
- [70]三十年来误国卖国酿成今日巨患[N]. 北平晨报, 1931-09-22(2).
- [71]北平晨报·国难写真[N]. 1931-09-26(1).
- [72]周若冰. 北平晨报社参观记[J]. 民国新闻, 1933(1-2): 29-30.
- [7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文史资料选辑: 第20辑[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 [74]珍闻[J]. 现实(南京), 1936(3-6, 7): 164.
- [75]中日人士宜多接触[N]. 北平晨报, 1936-03-19(2).
- [76]中日关系调整之前途[N]. 北平晨报, 1936-03-21(2).
- [77]所望于有田大师者[N]. 北平晨报, 1936-03-25(2).
- [78]田雨时. 我办北平晨报[J]. 传记文学, 1975(26-4): 35-42.
- [79]杯桊. 北平晨报自力更生[N]. 晶报, 1937-02-05(2).
- [80]管翼贤. 北京报纸小史, 新闻学集成: 第6辑[M]. 北京: 中华新闻学院, 1943.

【责任编辑 刘婉华】

## The Evolution and Relocation of the “Morning Post Group”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1916–1937)

ZHENG Siyuan & FU Dengzhou

**Abstract:** The “Morning Post Group” primarily consisted of Morning Bell (1916–1918), Morning Post (1918–1928), New Morning Post (1928–1930), and Beiping Morning Post (1930–1937). It stood as the longest-running newspaper network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was marked by the most intense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most frequent shifts in editorial stance. The group’s three successive name changes were not only direct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contestation over public opinion resources but also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al continuity maintained by its journalistic community—through the withdrawal of old members and the joining of new ones—in a form of editorial relay that ensured the survival and evolution of the group. Throughout its two-decade history, the Morning Post Group repeatedly faced surveillance, censorship, and forced closures by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yet it continually resurrected itself amid the turmoil of shifting power. Under constant pressure from competing political factions, its editors continuously adjusted their strategies in pursuit of editorial autonomy and fairness. However, this pursuit engendered a fundamental paradox: The more the group attempted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politics, the more inevitably it was drawn into the political vortex; the more it sought to avoid warlord interference, the more vulnerable it became to the encroachment of other political forces. Similarly, the more it emphasized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ity as professional ideals of press freedom, the less it could independently determine its editorial content and agenda. This paradox reflects the Morning Post Group journalists’ struggle and adaptability as they negotiated between the disciplining force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ir professional ideals. It also provides a valuable historical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ical trend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essence, the trajectory of the Morning Post Group sketches a vivid historical portrait of how Chinese journalis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neuvered within the tight space between 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pursuit of press freedom.

**Keywords:** Republican Era (of China); Morning Post Group; journalist community;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